

生存困境与文学空间理论的突围

——兼论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

妥建清 张 媛

【摘要】有别于文-图摹分意义上的文学地图理论,罗伯特·塔利赓续詹姆斯的“认知地图”思想,揭橥文学写作即“绘制地图”的理论。塔利在深入诠释人的存在、处所意识、文学制图三者之间本质性关联的同时,主要阐述文学制图的空间性、隐喻性以及意识形态生产的特征。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以文为图来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不仅为地理批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而且将文学制图理论升华为攸关人的生存之学,文学制图所绘制的文学空间作为本真性的空间,成为人走出空间焦虑和表征危机的“人生地图”。在此意义上,塔利提出文学制图理论,旨在从文学制图的视角,促进人类美好生存。

【关键词】罗伯特·塔利;文学制图;空间性;隐喻性;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妥建清,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美学、文艺理论研究,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28号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电子邮箱:tuojianqing@sina.com (710049);张媛,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西安理工大学讲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电子邮箱:zhangyuan_0212@stu.xjtu.edu.cn。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沪),2023.4.82~9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0)、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传播史的书写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AZD032)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空间问题的日益凸显,空间研究话语不断膨胀,形成西方学界备受关注的“空间转向”。作为“文学/文化空间研究”代表人之一的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提出了“文学制图”(Literary Cartography)理论,在晚近西方地理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别于文-图摹分意义上的文学地图理论,塔利赓续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ric Jameson)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思想,揭橥文学写作即“绘制地图”的理论。塔利强调文学叙事作为一种制图通过文本所建构的总体性的世界,重新弥合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以此回应人的空间焦虑乃至生存危机,为人的存在定向。此一文学制图理论不仅揭示出制图与文学写作的内在关系,而且将文学制图上升至人的生存层面,

为理解和反思人的生存现状开启更为宽广的视域。鉴于国内学界关于塔利文学制图理论的引介有限,^①尤其对塔利文学制图理论内蕴的生存价值尚有深入发掘的空间,本文将深入诠释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以期拓展国内学界有关文学/文化空间研究新的视野。

一、我绘图,故我在:文学制图与人的存在之定向

现代性对空间的促逼加剧了人与世界的疏离,凸显了人的生存困境。正如詹姆斯的“新空间性”(new spatiality)(《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217)所说的那样,传统的地标已经不能为人提供指引,个体无时不处在一种超越了自身认识和感知维度的空间之中,导致其完全不能从透视或者立体的角度去把握距离,世界由此变成一个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

无法解读的超文本。(《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05—407)人之在世急需一种无论是具体的还是象征性的“空间架构”(spatial frame),以此获得方向感和安全感。(段义孚,《无边的恐惧》178)

针对此种后现代状况下的空间迷失,塔利继承了海德格尔(Tally, *Topophobia* 81)、卢卡奇(Tally, “Mundus Totus Exilium” 214)、萨特(Tally, *Spatiality* 65)等人的思想,深入揭示了隐含在空间迷失背后的人的存在危机,提出“处所意识”(topophobia)的概念以诠释此种现象。“topophobia”是塔利创造的一个名词。(Tally, *Topophobia* 34—37)从词源考古学而言,“topo”源于希腊语词根“topos”(place,或译处所、场所),指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处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点或空间,“phobia”(mind)原意为“疾病”“障碍”,常常使人联想到“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词。塔利在此并不想用“topophobia”指代某种疾病,而是用其来表示人对于处所有所意识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与处所相关的焦虑、不安与恐惧的主体体验。(朱立元等 143)从“处所”或“场所”(topos)的含义而言,其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空间观念。亚里士多德曾将“处所”界定为一种概括空间经验的哲学范畴。在亚氏看来,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某一处所之中,处所是特定事物所处的具体的、有限的空间,与物体的存在密不可分,是物体固有的属性。(吴国盛 3—9)随着近现代思想家对于空间的反思,“处所”衍生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处所”既不是人的客观生存背景,也不是与人无涉的“对象化”空间,而是“我”与世界交往的场所,代表着此在与世界之间生存性的空间关系。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auen Wohnen Denken*)中通过“栖居”这一概念揭示了处所所承载的生存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处所(topos, ort in German)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聚集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供人类“栖居”的家园,它促成了“人与世界的相属关系”(塞普 231),代表了人类本真的生存状态。此种人

在“去存在”过程中产生的个体的内在体验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所形成的“家园”,即“自我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场所”,是理解“生命(Bios)的一个谱系场所”,其比之于空间更接近存在的本源。(205—211)挪威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承袭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处所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其蕴含着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精神,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意向性和属人的特征。(7—10)

塔利强调,此种对于处所的需要和关切逐渐凝聚成了埋藏于人类精神深处的“处所意识”,它表现为主体内心持久的地方关切(placemindedness),其揭示了人“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思考地方……以及主体和地方之间的关系”(Tally,《文学空间研究:起源、发展和前景》126)。而此种持续、强烈的处所意识既可能激起人对于某个特定地方的热爱和依恋之情,给予人归属感和安全感,即段义孚所言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恋地情结》136),又可能使人形成对特定地方的害怕、畏惧之情,即“恐地情结”(topophobia)。(Trigg xxi)然而现代性对于空间的促逼使得原本承载生存意义和情感价值的处所被不断地消解,处所被化约为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感”的城市空间网格,个体与处所的同一体性由此断裂。人从而陷溺于一种“不知其所”(out-of-place)的状态,再也无法回归那种能够提供支撑和定向的精神家园。由此,塔利“越过‘恋地’‘恐地’的对立”(陆扬 26),强调融入人的主观经验的处所意识是指一种令人体验到的不满、不快、不安的空间焦虑,主要是人对逝去的处所及其所代表的存在方式即“无”的“焦虑”,纵使人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地方(如家中),也会感到无可名状的不安,甚至是恐惧。(Tally, *Topophobia* 42—43)此种处所意识与海德格尔所言的“烦”(angst)、萨特所言的“恶心”(nausea)(81)相埒,是一种对生存的“无根性”之焦虑,其使人们陷入某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莫兰 269)此种永远失去处所的痛苦和如影随形的处所焦虑渗透在人的思想以及行为中,支配着人的整

个生存状态。

有鉴于此,塔利继承了詹姆逊的“认知绘图”思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22),进一步提出文学制图的理论。塔利认为文学是一种制图/绘图(mapping)形式,是记录“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状况中所面临的混乱空间与社会混乱”(朱立元等147)以及解决此种空间迷失的一种想象性的“绘图”策略。在塔利看来,文学具有一种类似于制图的功能,能够通过叙事象征性的表征社会空间绘制出一幅完整的且具有意义的世界图景,为主体理解和反思抽象的后现代空间提供一种清晰易读的“全景图”。实质上,塔利强调文学制图是以叙事的方式为世界“赋形”,其目的在于营构出一个具有意义的整体世界,此一世界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改写抑或是对替代性世界的想象,也是对世界系统中显然不可表征的整体性的象征性建构。此种文学叙事所绘制出的文学空间作为一种本真性的空间,它扬弃了空间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揭示出人与世界根本性的存在关系,即人“在世界中”,从而开启了人的本真性反思。

首先,此种叙事地图投射出一个有意义的空间框架或参考系统,使得个体能够在与自己有关的、更广阔的全球整体空间中为自身定位,摆脱空间迷失之感。于此,文学制图便以一种比喻性的方式绘制出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地图”。当作者试图在页面的空白处绘制文学地图时,他不仅勾勒出了一个文本世界的轮廓,而且使得文学创造的世界成为可能。此种文学创造的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而是一个独立的、丰满的世界图景,它揭示并建构出隐蔽的生活总体,使得个体在支离破碎的现代生活中重新把握“方向感”。

其次,文学制图从宏观的“地图”视角再现整体空间结构,还着眼于重建空间的“深度感”。其通过语言文字将人的经验编织成可识别的图景,同时借助隐喻等修辞手法构建出富含象征意味的空间,呈现出世界的意义。透过此种隐喻性的空间,主体将

个人局部的生存空间与抽象的整体系统联系起来,消除精神上的迷失感,重新找回生存的意义。(Tally, *Topophrenia* 15)

最后,文学制图亦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作为整体的全球空间,以象征性的手法再现某种政治文化逻辑和意识形态,或者建构出作为“想象性解决方案”的理想的空间形态,批判、甚至抵抗片面的意识形态思想,将广阔的难以把握的后现代空间“转译”为一个整体或一幅图画,不仅为个体重新找到自身的位置,而且还有助于恢复一种“总体意识”,甚至建构一种适应于后现代“新空间性”的空间认知模式。

职是之故,地图和文学实质上攸关个体的定位。如果说地图的作用是提供现实空间中的位置坐标,那么文学地图便是在想象的空间中为人类提供位置的参考点,以此缓解人的无方向感和无归属感,进而找到精神上的栖居之地。在此意义上,相比于认知绘图,文学制图根本上是针对个体“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的筹划与定向。

二、文学制图:多重空间的建构

“文学制图”思想是塔利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有别于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将文学作品以实证性的地图或图表加以呈现的文学地图思想,塔利制图理论以“地图”比喻文学作品,以“制图”比喻作家写作过程中对空间进行想象和表征的叙述方式,以“制图者”比喻作家或创作者。塔利并不拒斥文学作品中使用地图或图表,但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图或图表往往是补充性的图像,并不能取代文学制图,因为后者应由文学叙事予以呈现,而不是成为脱离文学语境的存在。(袁源 罗伯特·塔利5)文学制图预设了一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制图机制,视文学想象和叙事行为本身为制作地图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所有叙事形式都是文学制图”(Tally, “Mapping Narratives” 1)。而文学制图依托叙事象征性的表征社会空间,以此比喻的方式构建个体与空间、社

会及文化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重建人在世界上的方位感。于此而言,文学制图本质上乃是想象、表征、投射主体所在的空间以及更广泛世界的空间意向,其根本特征是鲜明的空间性(spatiality)。

文学制图的空间性,首先表现在作者通过文字所建构的“叙事空间”,它既包括故事中模仿现实世界的地理或生活环境,还包括与现实主义无关的“其他世界”(otherworld),诸如乌托邦、科幻题材所塑造的超现实抽象空间。这些都源于想象的介入。想象从柏拉图在“原本—影像”公式之中被贬抑为不在场的影像认识开始,直至启蒙运动中康德揭橥想象为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中介,想象理论发生了重大转变。康德强调想象既符合知性规律,又不滞于知性规律,其以游戏的方式使得知性概念自由活动而不逾矩,而且想象通过感性直观的形象显现出一种审美理想、理念,以此有限的感性形象表现出非言语的无限的东西。嗣后费希特发展了康德的想象理论,将康德意义上的想象从沟通感性与理性的中介转变为沟通我的无限性与我的有限性的桥梁。(费希特136)想象由此与自由相涉,成为人超越有限性的重要力量。而文学通过想象绘制出一幅广阔的、奇幻世界的文学地图,使得文学叙事的空间远大于现实空间。如是种种的“地图”不仅包含众多清晰可辨的地标、详尽的环境书写、几近真实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通过作者的描绘形成一个完整、与现实几乎无异的世界,以此回应现时代碎片化的、无法表征的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此一类叙事作品所建构的虚拟空间,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制、再现或者象征性的解读,也不是以理想的王国代替充满缺憾的现实世界,而是代表了人类想要解决现实焦虑、改变现实世界的一种“象征性行为”。(詹姆斯,《政治无意识》99)文学制图构建出的空间及文化整体性表征,如詹姆斯所言,为现实矛盾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办法”(57),为人提供了通往精神处所的认知地图,使得人能够更好地观照和反思现实世界,而这正是文学制

图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文学制图的空间性还表现在叙事层面,包括叙事情节的安排、叙事视角的转换及文体的选择。塔利曾在其论述中多次强调空间、文学制图与叙事三者间的深层联系,认为文学制图的空间性不只体现在对事件发生地点和人物活动场景的描绘上,还通过叙事本身得以呈现,因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必须嵌入叙事”,建构文学空间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讲故事”。(Tally, “Mapping Narratives” 2)塔利借鉴汤姆·希佩(Tom Shippey)提出的“地图式情节”(cartographic plot)(94)的概念,指出“小说的情节本身就是地图”(Topophrenia 133),即常常通过虚构的地名和地理环境描写勾勒出想象世界的地图,并投射出一个广阔的文学空间。小说中出现的地点并非毫无意义的地名,而是作者借助“描述性”(Tally, “Geopolitical” 15)的语言,联系事件及人物,创造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名称。其在传达出地点独特意义的同时,直接参与了故事情节的建构。因此,当空间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个想象的、作为背景的世界,更是文本表征和叙事本身,反映出叙事和空间之间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

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作家运用视角切换等方式凸显叙事的共时性特征,呈现出立体的空间化效果。(Rutledge 9-10)塔利参照詹姆斯和凯文·林奇(Kevin Lynch)对“游记/地图”(itinerary/map)的区分,将叙事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绘图视角。前者是以内部视角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通过记录主体的所见所闻,描绘出一幅存在之旅的路线图,由此表征的空间呈现出一种微观且动态的特征;后者则是以全知叙事者视角,绘制出一幅静态、共时且有序的全景概览图。不同视角下的流动的空间串联起来,创造出多维的、立体网状式的叙事空间结构,为读者呈现出全景式的空间图景。

综上,文学空间是由语言和想象共同建构起来的抽象的、艺术化的空间,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空间形

态,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空间形态生产出了不同的文学体裁(genre)。塔利认为,体裁作为“理解和为世界赋形的重要方式”(Tally, *Spatiality* 46),与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同构性特征。如果说史诗所表现的是史前那种圆融无碍、具有整体性的空间样态,现代小说描绘出的是丧失了文化完整性的社会空间,那么现代主义所表征的则是后现代语境下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全球化空间,而如此不同的空间形式和体裁也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文学地图。尽管所有叙事本质上都具有空间性,但实际上,某些体裁较之于其他体裁,“空间性”特征更为突出,诸如流浪汉小说、乌托邦文学等,其凭借密集的环境描写串联起整部作品的叙事线索,呈现出具体的可感的空间图景。(朱立元等 144)相反,另一些体裁会对具有特殊指涉意义的空间进行“前景化”处理,而将其余的空间留在模糊且抽象的背景之中。由此观之,文类的多样性造成文学空间的多样性,这势必要求读者在解读文学地图的字里行间时,深入挖掘其内在丰富的空间意蕴。

三、虚实相生的空间:文学制图对地方的重构

文学制图在表现其“空间性”的同时,亦显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赋予了文学地图艺术生命。就地理科学而言,地图并不如镜子一般能完全复制现实世界的全貌,而是对现实空间的各种特征进行了选择、突出等。文学制图亦复如是,它借助语言符号系统,以比喻、夸张等修辞方法,象征性地表征社会空间和主体所在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塔利指出所有的地图都是虚构的,地图的不同表征形式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Tally, *Utopia* 7)文学制图通过想象建构的空间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元素,是一个“真实并想象”(real-and-imagined)的世界。此种“真实并想象”的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现象学空间,其在作者与读者的动态建构与多维度阐释中被不断地赋予多层次的表征意义,呈现出文学地图隐喻的艺术逻辑。

隐喻不仅仅是富于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表达,抑或对事物进行比拟的文学修辞手法,更是人类用以理解和界定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人的概念系统、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的基础。(莱考夫 约翰逊 1—3)此种隐喻性的思维植根于人的日常经验,深刻影响着人认知、阐释世界的基本方式。此种以隐喻为基础的概念系统映射至人的语言系统,促成了隐喻性的语言表达。质言之,语言不是借由隐喻的技巧展现自身,语言本身就是隐喻的体现,隐喻性乃语言的本质。在此意义上,文学制图作为一种隐喻性的话语体系、表征方式,是作者结合自身情感、体验,为现实世界编码的过程。在表征策略的选择、叙事框架的安排和修辞的运用等各种制图流程中,作者的精神和思想无处不在,时刻体现着创作主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由此创造出来的文学地图在描摹外部世界的同时,承载着作者的主观体验、感官知觉和对于文化的深刻思考,使文学地图上离散的点从无差别的抽象空间中分离出来,成为可识别的、富有特殊意义和情感价值的“地方”(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110)。读者在阅读这些“地方文本”时,并不只是联想到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点,而会从它与作家的关系角度进行思考,进而理解作家赋予地方的深刻喻义。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此种倾注了创作主体情感与信仰的“地方”会以独具象征意义的空间意象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显现出植根于文学制图深处的艺术化虚构和隐喻的特征。此种意象化空间不再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和体验的表征性空间,直接参与文本的意义生成和情节的构建。实质上,作者写作的意图并非描摹现实世界,而是以含蓄的空间意象隐喻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遭遇的精神困顿,表征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传递人类对往昔人与世界之间亲密关系的追忆与怀念。作家正是通过隐喻性的空间以及诗化的想象,进而反思自身存在的本真性,意识到并重新建

立起人与世界的关系,超越现实的无目的的世界。
(加塞特 192)

进而言之,描述某一地方的空间意象并不是片面、孤立、扁平化的存在,相同或不同创作者围绕某一地方所绘制出的空间意象会呈现不同程度的重叠、交叉,从而融合成多维度、立体的地方。此一地方超越了客观地理位置,被多重空间意象重构成象征性的空间符号,传递出复杂的、多层次的隐喻意义。显然,作家笔下的文学地图已不再与现实的指涉物对等或重叠,因为空间的样态完全“取决于空间所附加的意义”(Tally, “The Space of the Novel” 156)。不同的作者从自身的视角出发,或写实或虚构地将地方的某个意义放大,绘制出风格迥异的文学地图。而这些看似独立的地方或文学地图,其实是多重的空间意象和多层文本叠加的总和。正如塔利所言,在文本之前必定还有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构成的”(Tally, *Topophobia* 44),任何文学地图都是在与其他地图的互动阐释中相互构筑,形成更大的文学地图,同时生产出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化表征意义和隐喻内涵。此种通过文字构建的文学地图在头脑中产生的空间深度及其承载的隐喻意义,不仅能使个体的日常经验更有意义,而且能“启发并引导人的思想”(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144),甚至能改变人存在的方式。这恰恰是图形地图无法企及的。借助隐喻性语言,作家或读者便能够透过叙事有意识地去想象、描绘、体验心中所向往的世界,从而更好地观照现实、重新定义现实,在实践中“尽力将设想变为物质现实”(171),并最终超越现实。质言之,人能够立足此在思考更高维度的存在,在生活世界中实现和展开存在,使存在之真理得以发生、显现,并超越有限的此在,抵达无限的意义世界。

诚然,作家在绘制文学地图的过程中构建出了一个富含象征意义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地图隐喻意义的生成是自发的元地图行为。除了作

者,读者也是文学地图意义生产的主体。从文学地理批评的角度看,文学地图绝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等待解释的成品,它是在创作和阅读中不断“发生”的,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形成文本的“空间实践”。一方面,读者必须通过一定的空间实践,如比较和联系文本中出现的空间元素,对文本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才能够观照整个叙事空间的全貌;另一方面,阅读可被视为文本的延续,是文学地图的“再创造”。读者内在的制图冲动及其想要将自身与周围环境相联系的处所意识,促使其在“阅读”文学地图的同时,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出发理解、阐释文学作品,构筑出交织着现实和幻想、文本与现实交互的艺术化空间。由此,叙事地图必定会同时呈现出创作主体和阅读者的双重轨迹:作家通过叙事勾勒出文学地图,而文本本身也是待绘制的文学地图(Tally, “Mapping Narratives” 3),后者经由读者创造性的阐释,生产出了新的且更为深刻的隐喻意义。因此,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保持着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动态张力关系,为创造文学地图蕴含的隐喻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制图的政治权力想象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权力存在于一切社会空间结构之中,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规训与惩罚》221—223)文学空间亦复如是,它绝不是中立的画布,而是一种表征性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说的充满象征的再现的空间、“符号的空间”(索亚 87),是填充着权力意志、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的缩影。(伊格尔顿 85—96)詹姆斯亦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开篇就指出,包括叙事、阅读、阐释及批评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都是渗透着“政治无意识”的“社会的象征性行为”(1)。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并非对外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或演绎,而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即对多种意识形态原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的结果。(伊格尔顿 109—135)因此,

文学制图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文学制图的过程中,一方面,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之中,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必定会受到社会“知识-权力”网络的塑造和影响,因此其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地图会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社会权力意志的痕迹。当作者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的观念一致时,作家会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的政治视野和价值立场对所表征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借助话语和修辞技巧,巧妙地将所要表达的内容聚焦在暗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虚构成分上,弱化或省略不相关的元素,逐步实现隐义权力的外化。而当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不一致或对立时,此时文本会在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运动中冲破固有的意识形态限制,生产出自身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机制中,文本或文学地图的意识形态生产呈现出塑造个体意识形态的力量。文学生产是使个体被接纳并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它借助意识形态和强权话语绘制叙事地图的过程,实际上是福柯所言的“知识权力化”的过程,其所生产出的权力性知识不仅赋予客观世界新的秩序,也在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建构和主体的价值判断。

16—17世纪的英国文学就是通过“国家叙事”及“海洋叙事”,以“开拓新世界”和“教化使命”为主题,描绘出彼时英格兰文学地图的政治权力想象,成功建构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逻辑。小说家作为帝国的代言人,常常以文学为手段把殖民主义价值观强加给国内外的读者,以证明国家领土扩张所发挥的文明开化作用。殖民主义视地理上遥远的国度为落后于历史的“荒岛”,将其他民族视为被妖魔化的“他者”。此种政治逻辑以欧洲白人为参照系建立了一套人性的判定标准,把白人塑造成为优越、合法、正义的普世形象,而把被殖民者贬低为不文明的“非人”。这些“非人”令人恐惧的原

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邪恶,而是由于其不符合标准的“他者”。他们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之外的怪异的、外来的群体,而文明人的责任是将这些处于地图边缘的“空白区域”带入现代世界,纳入帝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以完成其不断宣扬的拯救异教徒、开发世界市场的“文明使命”。如是种种,殖民主义的政治逻辑表现出一种“文明—野蛮”“中心—边缘”“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Tally, “Spaces That Before Were Blank” 186—187)此种殖民主义叙事作品亦充满了帝国说教,将“帝国的对外扩张演变成为艺术的资源”(汤普森99)。更重要的是,殖民、帝国主义所输出的文化不仅显示出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传递着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力量。在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和压迫下,被殖民者开始否定自己的文化,并逐渐丧失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法农,《黑皮肤,白面具》9)此种文学中嵌入的隐形的政治逻辑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表明叙事形式本身就是实现殖民化的一种方式,它巩固了帝国主义在海外的文化及意识形态扩张。

不仅是国家叙事,从虚构的奇幻文学和乌托邦文学中也能够看到意识形态作用的痕迹。乌托邦文学作为回应现实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想象性解决方案,本身就代表着某种社会政治假设或政治立场,显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417)塔利指出,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乌托邦文学主要以民族国家形式为原型,其通过描绘“世俗外”理想国的社会图景,表现城市集权主义和超级大国的国家形象,此时的乌托邦主要是作为一种寓言结构为国家形态服务。(Tally, *Utopia* 74—75)到了全球化时代,乌托邦文学则放弃了对民族国家形式的关注,转向描绘被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取消了国家界限的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或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此时乌托邦旨在通过绘制“一幅新的后国家地图诠释资本主义跨国势力的流动”(Tally, *Utopia* 66)。进入20世纪,乌托邦叙事直接颠覆了隐含着希望的

理想王国的魅影,走向了反乌托邦的文学形式,在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的怀疑和恐惧的同时,也反思现代性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以此反向阐释并解构后国家时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政治文化逻辑和意识形态。

诚然,文学能够通过象征性的手段再现社会意识形态,但如果只是将文学制图视为表征权力意识或维持空间不平等的手段,则失之片面。换言之,文学制图既有放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政治逻辑的一面,也有批判、革命和反抗现有秩序体系的一面,后者大胆地冲击现存文化和价值观中消极、负面的思想或精神,甚至批判现存世界的空间不平等、区域边缘化以及帝国主义的霸权话语。正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言,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暴力,殖民地被奴役的历史是从失去地盘开始的,对于殖民主义的抵抗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地理领土的重新划分、重新命名和改变归属,且此种“抵抗是在文化土壤上得到表现的”(284),其对于“领土的恢复最初只有通过想象来完成”(320)。因此,后殖民作家和理论家们在重新绘制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地图时,常常通过修改某个地方的地名及地理表征方式,对抗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Tall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Geocritic” 7)他们尝试打破殖民者建构的帝国神话,并对占统治地位的种种话语意义进行重塑,以此解构殖民者的权力话语模式,重新夺得叙事的权力。综上,文学制图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再现,更是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批判和超越。

五、文学制图学:文学制图的视角,为人类美好生存的目的

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以文为图来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而且将文学制图升华为攸关人的存在之学,成为人类走出空间焦虑和表征危机的“人生地图”。

文学制图理论是一种文学之思,更是一种“生

存”之思,其透过蕴含丰富生存意义的文学空间,完成了走出文学文本、回归人类本真空间的转向。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超越了反映现实世界的静态空间图示,绘制出一个能够为人提供整体感与意义感的文学空间。有别于“人皆如此”的“常人”状态,此种文学空间使人能够“充分意识到同世界之间的根本关系”(雷尔夫 105)——“在世界之中”不仅在空间维度揭示“世界”之于“人”的“非对象化”存在,而且从时间维度揭橥“人”之有限性存在的觉悟之情,所谓“人”“在世间”,“在世”不是“无间”的空间性存在,而是“在世”有“间”的时空性存在。在此,塔利的文学制图所绘制的文学空间与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作为一切艺术之本质”的“诗”(Dichtung)所涌现的意义世界若合符契。海德格尔指出,“诗”不仅以美启真,通过解蔽艺术中的诸元素以本源性的样态在天地神人共同演绎的作品世界之中,显现出丰富而深沉的意义图景,而且“诗”中意义世界的涌现为此在筑建“家园”,“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海德格尔 15)。而在此“家园”之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得以重构。人悬置了基于一般理性态度的反思性(Reflexivität),从现代科学所支配的座架(Gestell)当中抽身而出,开启本真性的反思,世界亦不再是与人照面的诸现成表象的集合,而是化为镜像(Bild)样态的存在。寓身于具体境域的人不再单向地向世界攫取意义,意义绽出了世界,同时亦将人一并带出,人与世界遂呈现出亲密的共属(Zusammengehören)关系。由此始于人与世界之间相对立而导致的意义丧失与遮蔽的危机得以在本源处克服,“在世界之中”的“我”与世内存在者和谐共处,共同编织了使每一个体获得幸福的生活世界之网。于此而言,文学制图所描绘的内蕴丰富的真理空间在带给人切身的空间体验的同时,开启了人的本真性反思,使人觉悟“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非本真”的状态,返回人的本真状态,从而使获得自己本身。

文学制图学所描绘的叙事地图,不仅为人提供了想象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的新方式,而且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修复”现实空间的可能。面对现代性的逼仄所产生的空间异化,文学制图学通过对世界总体性的想象性建构以及空间意义的发掘,发挥着定向的功能。它超越了主客二分意义上的现实空间,重新建立起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性关联,恢复了空间“属人”的特质。在此修复性的空间中,现代人渴望却无法企及的生命整体以叙事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其启发并引导人重新审视和反思异化的现实空间,不断地探索并重构出孕育着美好和诸多可能的“希望的空间”。正是在此“希望的空间”之中,主体与世界、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区隔不复存在,彼此交汇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文学制图学所绘制的“真实并想象”的世界是不同于乌托邦世界的。现代西方学者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曾指出,“已知的希望”作为人类情绪活动中最富人性的东西,总是与“尚未”的最辽阔、最明亮的视域相联,敞亮着此在的世界。与宗教所表现的封闭的、永恒轮回的世界不同,希望的世界是朝向未来的世界,它虽然在客观上“尚未形成”,却代表了“真正的未来”。(67)文学制图学所描绘的“真实并想象”的世界正是此种“已知的希望”的世界,它是以现实的可能性为基础的面向未来的世界。此一世界亦发挥出一种信仰的作用,其通过绘制出的完整的意义世界,给人一种超越和广大的非直接经验的实在感,使人跃出一己的感知而展开与世界上他人、他物的交往,达至“万有相通”的境界,从而赋予现代世界目的、意义及其秩序,以此拯救现代性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的危机。由此,文学制图学从处所意识出发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生存危机的根源,以艺术化的手法弥合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从而修正了无目的的世界,完成了对现实空间的修复。

通过“文学制图”的眼光重新观照人类生存世界,文学制图学已成为为人类美好生存的“人

学”。塔利提出的处所意识表征出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危机,文学制图借由叙事所绘制的本真空间,重新恢复被现代性所褫夺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共生之道。在此意义上,文学制图不仅修复了现实的异化空间,而且扬弃了人的异化,引导人不断地超越自我,使人成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一方面,文学制图所绘制的世界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或模仿,而是建构了一个具有家园感的空间,在此属人的空间中存在着人的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想,借此把人从日常工具理性的宰制中解救出来,使人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2)。文学制图学关注人的感性及非理性的一面,通过想象、隐喻、象征等手法表现出人类共通的情感、记忆,唤醒人最真实、最本然的体验。另一方面,文学制图所绘制的整体世界弥补了现实世界中的缺憾,将不在场的“总体性”显现出来,使主体以超越性的角度把握有限的现实世界和自身的生存境遇。在此意义上,文学制图可被视为突破日常经验而又关联日常经验的超越性活动,它并不否定现实生活的有限性,而是从有限出发不断地接近无限,重新赋予生存的有限性价值。文学制图发挥出的此种功用“使人既不脱离现实(入乎其内),又能摆脱‘欲求、异化和自我束缚’,达到一种不依傍他者、不为外物所累……超脱功名利欲的自由境界——‘本真状态’”(张世英336)。于是,主体以敞开的无限性超越了给定的现实和分裂的自我所受到的限制,从而消解了人的异化,使人重新找回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不仅关涉文学的存在方式,其始终以文学为中心,探究作家如何通过叙事绘制文学地图,进而象征性地表征社会空间,而且攸关人的存在方式,借由文字建构的隐喻空间开启人的本真性反思,从而“有改变观念的力量,以至于任何‘存在’(现实)不再完全一样了”(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145)。更为重要

的是,文学制图还唤起了人们对于“家园”的深度思考,突显了作为人之存在特征的处所意识和“归家”的精神信仰。文学地图犹如黑暗中为人导航的“星座”一般,给“茫然失所”的人带来慰藉,使个体终能找到那条存在意义上的“归家之路”。由此,塔利蕴含丰富生存意义的文学制图学最终走出文学文本,成为致力于人类美好生存的“人学”。

注释:

①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塔利文学制图理论的研究,主要以朱立元、陆扬、方英等人为代表,参见朱立元、陆扬:《关于空间理论和地理批评三人谈——朱立元、陆扬与罗伯特·塔利教授的对话》,《学术研究》1(2020):143—148。参见陆扬:《空间转向和塔利的空间批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7.2(2020):120—127;《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文艺研究》06(2021):18—28。参见方英:《空间转向之后的存在、写作与批评——评塔利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外国文学》03(2021):181—191;方英:《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外国文学研究》42.02(2020):39—51。参见齐艳:《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2020年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

- [1]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 [Bloch, Ernst. The Principle of Hope. Vol. 1. Trans. Meng Ha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ed.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 Engels.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3]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 [Eagleton, Terry. Criticism and Ideology. Trans. Duan Jifang, et al.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21.]
- [4]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2005年。

[Fanon, Frantz. BlackSkin, White Masks. Trans. Wan B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5]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Fichte, Johann Gottlieb.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Trans. Wang Ji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Liu Beiche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7]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去人性化》,莫妮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Gasset, Ortega Y. 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 Trans. Mo Yan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8]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等主编,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Heidegger, Martin. Collected Works of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Eds. Sun Zhouxing, et al.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王逢振主编,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Jameson, Fredric. Critical Theory and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s. Ed. Wang Fengzhen. Trans. Chen Yongguo,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主编,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Globalization. Ed. Wang Fengzhen. Trans. Wang Fengzhen,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Ed. Zhang Xudong. Trans. Chen Qingqiao,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政治无意识》,王逢振主编,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Ed. Wang Fengzhen. Trans. Wang Fengzhen,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Trans. He Wenzho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陆扬:《从空间观念稽考到空间批评理论》,《文艺研究》6(2021):18—28。

[Lu, Yang. "From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ce to Spatial Critical Theory."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6(2021): 18—28.]

[12]德尔默·莫兰:《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Moran, Dermot.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3]克里斯蒂安·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Trans. Shi Zhiming.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

[14]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Trans. Liu Su,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15]Rutledge, Thais, and Robert T. Tally Jr. "Formed by Place: Spatiality, Irony, and Empire in Conrad's 'An Outpost of Progress'."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 9. 1(2016): 1—16.

[16]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Said, Edward Wadie.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 Li K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7]汉斯·莱纳·塞普:《现象学与家园学》,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Sepp, Hans Rainer. Phenomenology and Ecology. Trans. Jin Xipi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18]Shippey, Tom. The Road to Middle-Earth: How J. R. R. Tolkien Created a New Mythology.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3.

[19]爱德华·威廉·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Soja, Edward William.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Trans. Lu Ya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20]Tally, Robert T Jr. "Introduction: Mapping Narratives." Literary Cartographies: Spati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Narrative. Ed.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12.

---. "Introductio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Geocritic." The Geocritical Legacies of Edward W. Said: Spatiality, Critical Human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16.

---. "Mundus Totus Exilium Est: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c in Exile." The Geocritical Legacies of Edward W. Said: Spatiality, Critical Human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209—222.

---. "Spaces That before Were Blank: Truth and Narrative Form in Melville's South Seas Cartography."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42.2(2007): 181—198.

——:《文学空间研究:起源、发展和前景》,方英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62.6(2020):121—130。

[---.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Trans. Fang Ying.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Edition)62. 6(2020): 121—130.]

---. Spati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of Middle-earth." Topographies of Popular Culture. Eds. Maarit Piipponen,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11—34.

---. "The Space of the Nove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Novel. Ed. Eric Bul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52—167.

---.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 Utop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pac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1]埃娃·汤普森:《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Thompson, Ewa Majewska.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Trans. Yang Deyo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Trigg, Dylan. *Topophobia: A Phenomenology of Anxiety*.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23]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宋秀葵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Tuan, Yi-Fu.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 Trans. Song Xiuku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0.]

——:《无边的恐惧》,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Landscapes of Fear*. Trans. Xu Wenn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rans. Wang Zhibiao.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恋地情结》,志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 *Topophilia*. Trans. Zhi Che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24]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

[Wu, Guosheng. *Development of Greek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ce*.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4.]

[25]袁源 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与教学:罗伯特·塔利访谈录(英文)》,《外国文学研究》41.3(2019):1—15.

[Yuan, Yunsu, and Robert T. Tally Jr. "Doing and Teaching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T. Tally J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1.3(2019): 1-15.]

[26]张世英:《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Zhang, Shiyong. *Beauty al Liber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ino- European Aesthetic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27]朱立元等:《关于空间理论和地理批评三人谈——朱立元、陆扬与罗伯特·塔利教授的对话》,《学术研究》1(2020):143—148.

[Zhu, Liyuan, et al. "A Trialogue on Space Theory and Geocriticism—A Conversation between Zhu Liyuan, Lu Yang, and Robert T. Tally Jr." *Academic Research* 1(2020): 143-148.]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and Breakthrough of Literary Space Theory:

A Study on Robert T. Tally Jr.'s Theory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Tuo Jianqing Zhang Yuan

Abstract: Robert T. Tally Jr.'s theory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a development based on Frederic Jameson's notion of cognitive mapping,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maps which focuse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ext and map. Tally's literary cartography not only engages the fundamental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existence, topophobia, and literary cartography, but also reveals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such as spatiality, metaphorization and ideological productivity.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world through the lens of text as map, literary cartography not only introduces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y to literary studies and geocriticism, but also turns to the study of human existence. Conceived as a way to create authentic space and overcome spatial anxiety and representational crisis, literary cartography has switched from merely drawing literary maps to creating maps of people's lives. Tally's literary cartography projects a map of human existence through literary mapping, for the sake of humans' well-being.

Key words: Robert T. Tally Jr.; Literary cartography; Spatiality; Metaphorization; Ideology